

投稿邮箱:www.85193207@126.com

【齐鲁学人】

□甘险峰

云洁月皎心自知 ——怀念刘乃昌先生

2015年2月2日晚,一代学术巨擘刘乃昌先生驾鹤西游了。作为山东大学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先生留下等身著作与锦绣文章,特别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斐然成就。他的学术成果持续不断地滋养着后世学人,此时此刻更加让人缅怀和追忆。

刘乃昌先生于1930年生于山东滕州市,幼年接受了严格的私塾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1949年,刘乃昌先生被保送至华东大学,后转入山东大学,师从吕荧、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诸师。1953年毕业留校。1956年,先生又考取了杭州大学的研究生,就学于“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门下,专治词学与两宋文学,从此与中国古典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59年研究生毕业后,先生执起曲阜师范大学的教鞭,历任副教授、教授、《齐鲁学刊》主编、文学研究所所长、副校长等职。1989年调入山东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在一个甲子的漫长学术生涯中,刘乃昌先生孜孜矻矻,宵衣旰食,用勤勉的汗水换来丰硕的果实。他先后出版专著十余种,主编图书亦近十种,参与撰述大型图书3套及诗话、词话、工具书和文学普及读物数十种,并陆续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史哲》、《词学》及香港《中华国学》等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百余篇,其中包括《宋词的刚柔与正变》、《宋诗论略》、《闪光的人格风采和深沉的社会意蕴——宋代文化概观》、《论赋对宋词的影响》、《苏轼的文艺观》、《柳絮池塘淡淡风——浅议晏殊诗风》等或高屋建瓴、或见微知著的影响深远的高水平论文。其论著曾获夏承焘词学奖和各个级别的社会科学成果奖。这些突出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担任过很多学术职务,比如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典文学年鉴》编委、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连续多届担任山东省政协委员。1990年被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

刘乃昌先生的宋代文学研究是以苏轼(轼)、黄庭坚(坚)、辛弃疾(疾)和姜夔(夔)四家为重点,辐射两宋文苑的宏观课题。从首开一代文章风气的王禹偁直到宋末遗民

诗人,诸如王安石、司马光、曾巩、“苏门弟子”、李清照、文天祥等,先生皆有涉猎。其视野之开阔、研究之深邃,令人叹为观止。

在诸大家的研究中,先生均有专著问世。早在1979年,先生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辛弃疾论丛》。此书既从辛弃疾的时代环境、哲学思想、爱国情操、朋辈交游等层面的深入剖析上揭示稼轩词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又系统评析了各类辞章的艺术内涵和独具风神,对辛弃疾研究中的诸多悬案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苏轼选集》是在全面审视苏轼创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国内第一部融苏轼诗、词、文于一炉的注释本;《苏轼文学论集》则多角度、多层次面对苏轼其人、其文及各文体创作加以评价,精湛的论析和独到的见识随处可见;《姜夔诗词选注》荟萃白石诗词名篇佳作,因姜诗向无注释,此书有导夫先路之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刘乃昌先生迎来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先后出版了多种学术专著。《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与杨庆存合作)是“三苏”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一项成就;《苏轼散文选》(与高庆奎合作)甄选苏轼各期散文名作,题解详陈写作背景,深挖思想内蕴,尤精于写作艺术的审美评析,融合了先生多年的研究心得;《东坡词》(与崔海正合作)将广为传诵的苏词妙品网罗备至,对在某一方面有代表性的篇章也酌情收录,反映了东坡词的总体成就和风格韵致的多种面目;《王安石

诗选年注》选取了王安石诗文280篇,除对诗文加以注释外,还就其主旨、背景及思想艺术特色等加以探究。因王诗向无编年,先生开拓之力功不可没;《宋词三百首新编》参照前人、近人研究成果,在吸取诸新旧选本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特别是其评赏文章,钩玄提要,言简意赅,融入个人心得,突出词章个性,令人拍案叫绝。

刘乃昌先生参加了多种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工作。在国家组织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时,先生应邀参加了撰写、编纂和审稿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是国家“七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先生是《宋辽金文学史》(二卷)的主编之一,并参与了这两卷的统稿、定稿工作。

退休后,刘乃昌先生仍然笔耕不辍。《宋词三百首评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5卷200余万字,与马兴荣联合主编)、《情理趣展妙姿:两宋文学探胜》、《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辛弃疾志》、《李清照志》、《苏轼与山东》等著作,均是先生退休后出版的力作。

刘乃昌先生的学风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研故出新,严谨求实,美善统一,质文相副,文行并重。正是对学术的痴迷执着,辅之以朴实严谨的学风,先生才学有所成、业绩骄人。先生尝有诗云:“百年末业树桃李,一生薄艺有笔耕。云洁月皎心自知,岂问笔瓢与万钟。”从中可以窥到先生淡泊名利、一心向学的崇高品格。



刘乃昌先生在书房

骨刻文: “证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齐鲁考古】

□凤巢

2005年春天,刘凤君在济南文物爱好者手里发现一块上面有刻画的小骨头,当时他认定:“这是史前的一块骨头,上面刻画的应该是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是中国早期的文字。”2007年7月他又发现和鉴定了昌乐县收藏的一批有刻画的骨头,当时刘凤君也认定是早期文字,并及时公开宣布,这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距今约4000—4500年,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这些年来,作为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刘凤君教授,一直全心致力于骨刻文的发现和

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我国发现最早的文字是距今约3300年的殷墟甲骨文。所以,国内外有些学者怀疑中国是否具有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一样的最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受到质疑。骨刻文的发现,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距今约4600—3300年,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

2012年山东大学成功申办2015年在济南召开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13年11月,刘凤君教授向该大会第五专题组“史前叙事”提交了题为《中国早期文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的论文。专题组召集人贝克教授给刘凤君教授回信说:“这一古老的书写系统(骨刻文)证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并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我们原本没有打算在‘史前叙事’这一议题

中讨论中国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要改变我的想法。”“我可以确定,让大会秘书处知道您已经申请参加我们的大会。”2014年5月6日,贝克教授给刘凤君教授邀请函,邀请他参加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作为重点发言人之一。

十九世纪末发现甲骨文以来,因为甲骨文已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大家都在探讨甲骨文起源问题,寻找中国更古老的文明,长期以来都徘徊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陶器符号上寻找答案。然而,这些陶器符号都距今约4500年,与甲骨文相隔1000多年的时间。刘凤君教授发现骨刻文初始,就认为骨刻文与甲骨文“有着内在的渊源和传承关系”。2009年,他明确提出:“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他在《文史哲》2013年第5期发表的《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文中阐述了骨刻文与甲骨文传承发展关系的六个方面:一、骨刻文产生和流行使用的年代距今约4600—3300年之间,甲骨文起始年代距今约3300年,两者年代衔接密切;二、在发现商代甲骨文的安阳和济南都发现了骨刻文,两者的风格也有传承和发展关系;三、两者都主要以骨头为载体,甲骨文发展为成熟文字,载体规范为主要用龟腹甲和牛肩胛骨;四、骨刻文发展到后期,几十字成行布局大量出现,为甲骨文的章法布局奠定了基础;五、两者字体造型都是在象形和指事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骨刻文后期字体的

图画性逐渐减弱,符号性增强,有的与甲骨文造型基本相似;六、骨刻文后期用于宗教祭祀的逐渐增多,也出现在了肩胛骨钻凿、烧灼占卜和刻字记事现象,这种做法和目的直接为甲骨文所继承。所以,甲骨文是骨刻文发展到晚期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类型。

随着骨刻文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今天西南地区的彝文和骨刻文相联系处较多。刘凤君教授经过研究认为,彝文是一种古老文字的传承,它与骨刻文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骨刻文在今天淮河、黄河和辽河流域有发现,特别是属古东夷地区的山东境内及周围地区发现较多。而彝文也称“夷文”,说明彝文和古东夷人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和史书记载远古时期东夷人大量迁徙西南地区的情况可互为证明。迁到西南地区的东夷人继续沿用骨刻文类型的字,几千年来虽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保留骨刻文以写实和指事为主的造字规律;其次,骨刻文多类似于绘画,笔画繁杂和简单皆有,用笔多用曲笔、弧笔和圆笔,也有直笔和折笔。彝文笔画也是少直笔,多曲笔和折笔,笔画类型复杂,保留了早期文字的特点;再就是,骨刻文和彝文有些字很相近,特别是骨刻文类似于树枝形的字,在彝文起源中就有树枝起源一说。所以,刘教授在研究骨刻文释读方法时强调“与彝文比较释读法”。

【听崔明泉讲文物故事】

在特殊岁月里 抢救稀世珍宝

□夏晓然



从废品回收公司捡回的“鲁伯大夫簋”

“文革”中,山东省文物总店因故好几年不开门,但济南市文物店只歇了两个月就正常开业,不往外卖东西,但正常收购。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济南市文物店的确是收入了很多好的东西。

像齐白石的精品画作,当时以130元钱收购,现在价值已经是好几百万元了。还有两个汉代的玉握猪,仅6元钱的价格买进来。而年代这么久远的玉器,材料好,做工也好,一点毛病也没有,这东西放在全国范围内,也算得上是稀世珍宝。

“文革”期间,我整天骑着自行车到处去看东西,被我发现的珍贵文物很多。

在红卫兵到处抢烧毁砸时,经常有人冒着犯政治错误的危险,拿着东西来文物店找我,问他手里的东西有没有用。我们文物店的人也经常往外跑,许多单位都去了。只要有人跟我说家里有点东西,估计比较稀罕,我都会上门去看。当时抄了的东西都放在街道办事处,济南市40个办事处,我都在那里认真挑选过珍贵物品。

堆放查抄物资最多的地方还是历下区将军庙街的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归历下区财政局管,局里的人有些保护意识,让我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东西。

在那里,我一眼就看中了一块残缺的国画,很明显是被人撕成了好几块。我看出来这是明代大家吴伟的画,于是又赶紧找出了另外三块,这幅画现在还在济南市博物馆里存放着。我的确在里面拣出来了一大批好东西,有唐代人的写经九十多件,还有几十张画。

我们在黑虎泉接收站收东西的那段时间,有一天去了一个人,拉着个地板车来,问我们:“我发现了个什么好玩的东西,小人儿要不要?”

原来这个人是在历下区运输队的,在无影山拉沙的时候,当地人挖出个墓来,出土了一些泥人,他们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正好那时我和博物馆的蒋宝庚都在,蒋宝庚是山东考古第一人。我们觉得这些泥人大有来头,蒋宝庚连忙跟着这个人去了无影山的工地,在那里又清理出来了西汉陶俑等大批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后来证实,那些泥人原来就是轰动全国的西汉杂技陶俑!

1969年,“九大”召开之前,大陆在为珍宝岛备战,文物店跟博物馆都在一个院子里轮流值班。一天,纬四路那里的一个回收公司打电话来,说有个铜锅,让我过去看看有没有用。我去了,看了那个“锅”的造型,第一眼就知道它很不一样!

回收公司说既然这样,就叫我去拿吧。但我觉得白拿也不好,回收公司就让我按照当时收废铜的价钱,把那个锅称了称,再加些手续费,这样就行了。后来经鉴定,它的名字原来叫做“鲁伯大夫簋”。

这是属于国宝级的东西,现在还在国家博物馆里展出。

1983年济南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对于在“文革”期间被抄来的东西,都要退赔给人家。博物馆那边当初收集的东西都有记录,所以收的东西是谁家的都很清楚,直接还给物主就行了。

当时的和平电影院还没有完全建好,里面有空地,他们就在里面拉上铁丝,挂上那些没有主的字画让人来认领,登记后拿走。字画差不多就有几千张,放在地上大大小小的物件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当时他们在收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出了钱的,但退赔也是国家的政策。

几千张字画,总算就这样陆陆续续全部发了出去,结束了落实政策的工作。

1964年到1985年前前后后20年就这样宣告结束,我的青春岁月就在拯救这些珍贵文物的忙碌中度过了。

(注:崔明泉为原济南市文物店总经理,现任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